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述略

李军晓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的历史,至今鲜为人知,本文拟对此作一述略。

一 办事处的成立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相继被日军占领,香港成了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渠道。在此形势下,1937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长江局讨论了中央关于加强华侨工作和国际宣传工作的指示,提出香港是“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应加强党在那里的的工作。旋即派廖承志、潘汉年以八路军代表名义到香港公开活动。

鉴于香港特殊而复杂的政治环境,为便于办事处顺利开展工作,周恩来在武汉特地当面告知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八路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赢得广大侨胞的钦佩,纷纷援助款项、医药和其它物资,可是没有机构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我们不公开挂牌,办事处是秘密的,将不妨碍英国(对中日战争)的中立地位,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这个要求得到应允。1938年1月,办事处正式成立,廖承志为主任,潘汉年协助工作。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载《广东党史资料》第18辑,第30页。

决定选派廖、潘二人赴港组建并领导办事处是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廖承志时任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他出身革命世家，有广泛的海外联系，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广泛国外生活经验的领导人”，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工作和上层统战的诸多优越条件。潘汉年长期战斗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谙熟中共统战政策，斗争经验丰富，是公认的“统战专家”和卓越的地下工作领导人。两人联袂赴港，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香港工作的高度重视。

办事处是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机构。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不公开挂出办事处的招牌，而是采用粤华公司的名义，以经营茶叶作掩护。其工作机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的一间大房子里，房门上方悬挂“粤华公司”的横匾。办公室用屏风隔成内外两间，外面是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间是会客室。廖、潘二人常在这里会见各方人士，海外侨领、华侨或港澳社团的代表和国际友好人士等。叶剑英、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也曾来到这里，对办事处的工作进行指导。

为适应香港极端复杂的社会环境，办事处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要求来运行，机构尽可能精练、高效。廖、潘二人是代表，连贯是办事处公开的负责人，总揽各项日常工作。下设交通、联络（包括电台）、宣传、侨务等部门，各部门工作人员根据各自工作的特点和需要，分别在香港、九龙的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工作点，平常不能随便到办事处去。连贯则主要通过地下交通，同各部门工作点保持密切的联系。据查证，先后派往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李默农（李少石）、梁上苑、潘柱（潘静安）、罗雁子（罗理实）、张淑芳（女）、冯劲持、杜埃、余明（女）、钟路（女）、高直（女，即李玉明）、张唯一、杨琳

夏衍：《我的良师益友》，载《廖公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页。

梁上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内情》，载《中共在香港》，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林青、李静(女)、阿新(陈永生)等。他们除少数是从中央部门调来担任交通和组织工作的,其他大多是当地和广州的中共组织选调而来的。

日本侵占中国领土,显然损害了英、美在华的传统利益,因而英、美执行援华制日政策,办事处正是在此背景下设立的。廖承志、潘汉年利用英日矛盾逐步激化和香港民众抗日情绪持续高涨的有利形势,带领办事处人员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掀起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二 卓有成效的工作

办事处成立伊始,就把为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募捐和接收、转运海外捐赠的款项和物资作为首要任务。当时,敌后抗日战场已经开辟,八路军伤员增加,医药奇缺,财力匮乏,物力补充困难。而由于国民党和华侨所在地当局的限制和阻挠,使得海外华侨和港澳人士与中共联系困难,银行也不愿接收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为扭转这种局面,办事处决定通过间接方式展开此项工作。一是以宋庆龄发起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名义去做,廖承志担任“保盟”的中央委员兼秘书长。宋庆龄在海外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海外侨胞都以能得到其亲笔签名或印章而引以为荣,办事处在给捐赠者的复信中都有“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签署,而“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救援物资,亦大多由办事处设法转送。二是通过廖承志的表亲、香港华比银行买办邓文田、邓文钊兄弟,把华比银行和大英银行作为接收汇款的地点,海外华侨可以把捐款直接汇交华比银行廖承志收,手续非常简便。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70页。

梁上苑:《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建立内情》,载《中共在香港》,第6页。

在办事处的积极工作下,华侨和港澳同胞开展的“援八”“援四”“援冯(白驹)”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仅在1938年,办事处以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潘汉年名义3次联名致函海外,吁请侨胞援助八路军将士,均得到热烈响应,取得显著成绩。1938年冬,办事处收到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计有130箱,由水运经淡水、惠州、老隆运至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再转运到延安。1939年10月,办事处收到南美华侨捐赠的大批西药以及东南亚华侨捐赠的20辆卡车和两辆轿车。这些物资都被转交给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后来,东江游击队派人在香港开办运输公司,专门秘密转运办事处接收的大批捐献物资。无疑,这些援助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战胜敌伪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起了重要作用。

另外,办事处还动员、输送了大批爱国华侨青年和专业技术人员回国参战。仅1938年和1939两年间,经办事处输送回国参战的便达6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新四军和八路军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材,如司机、医生、护士等。

办事处还推动和支持成立了众多的回乡服务团。服务团是华侨及港澳同胞直接献身祖国抗战的一个主要形式,其中组织规模和所起作用及影响最大的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东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团)、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会宁团)、香港学赈会回国服务团(港学团)等。各团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廖承志、潘汉年、连贯经常会见各团负责人,共同商讨救乡计划。1938年底,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团成立后,廖承志派韩托夫、文竞平、张翼等人到服务团帮助训练,为服务团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

《柯正平回忆》(1986年5月9日),转引自黄慰慈:《对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载《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第381页。

曾昌明:《回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和李克农同志》,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104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第470页。

线”、“论持久战”、“战地救护”等课程。对东团和琼团，办事处也多有帮助和指示。

廖承志、潘汉年领导办事处运用中共的统一战线策略，坦诚布公，广交朋友。两位侨领陈嘉庚和司徒美堂，和办事处都有密切关系。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到国内各地慰问视察，并到延安参观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烈欢迎。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认识到中国的抗战中心在延安，救中国者非共产党莫属。返南洋后，他向侨胞如实介绍所见所闻。这不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和不满，亦为英殖民当局所不容，他们在华侨中策动反陈，企图动摇其侨领地位。当陈处境困难时，办事处给予大力支持，除发动广大侨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外，还请示中共中央，以毛泽东、朱德名义致电陈嘉庚，以示鼓励。同时，廖承志还建议中共中央并周恩来：“以后凡同情我党的海外侨胞，我们不必把他们公开宣传，以免妨碍他们的活动。”这充分体现了办事处对华侨的理解和支持。经过这场风波，陈嘉庚更加坚定对中共的信任，对办事处的工作更是积极支持。当他得知《华商报》的印刷出版遇到困难时，便派得力助手赴港，开办有利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使其一直坚持出版至香港沦陷。司徒美堂也于1941年冬经办事处安排在重庆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转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积极动员在美华侨从财力、物力上帮助八路军、新四军。

办事处对爱国银行家邓文钊的统战工作也很成功。邓文钊是廖承志的表妹夫，出身于香港名门，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系硕士。他早年就有民族主义思想，后来在廖的影响和帮助下，爱国热忱日益提高，感到要救国救民，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他不顾自己的身家财产，甘冒风险，毅然接受办事处的委托，以自己任职的华

张奋：《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忆琼侨回乡服务团》，载《琼岛星火》第13辑。
《廖承志致中央并周恩来电》，1941年2月24日，转引自莫振山：《廖承志与华南的抗日救亡工作》，载《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
《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第468页。

比银行和自己经营的崇德堂进出口庄作为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1941年,《华商报》创刊,他负责经理部,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很大贡献。

对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延伸。办事处密切配合“保盟”,广泛联系国际人士,巩固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争取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有不少著名的外国医生和进步人士,如马海德、柯棣华、巴苏、伊文思等,就是通过办事处到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工作或访问的。

对华南的抗日武装斗争,办事处始终予以高度重视。早在办事处成立之初,它就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协助中共地方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如向地方党转送中共南方局的有关文件和指示,协助沟通地方党和海外的联系,协助地方党培训干部,同国民党当局交涉营救被捕人员等。

广州沦陷后,办事处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廖承志在港多次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海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曾生、吴有恒等研究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决定: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回惠阳县坪山建立惠宝工委,组织人民抗日武装。不久,以曾生为队长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先后成立。办事处在人力、物资上大力支援这两支队伍。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游击队的被服、军鞋和药品大部分是经办事处发动华侨、港澳同胞捐献的。经办事处组织输送到东江参加武装斗争的人员也在千人以上。在斗争中,两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华南抗日敌后战场三大主力之一——东江纵队的骨干队

廖承志:《东江纵队史·序言》(1983年6月1日),载《廖承志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页。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大事年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0辑,第7页。

杨世兰等:《廖承志》,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伍,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办事处也十分关心孤悬敌后的琼崖抗日武装斗争。廖承志亲自指导冯白驹领导的琼崖工农红军改编为抗日游击独立总队的谈判工作。在该部取得公开合法地位后,办事处在1939年8月和1940年夏先后购买3台收发报机和电台送给独立总队,并帮助沟通根据地中共组织与党中央、南方局的联系。办事处还十分重视琼崖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常给予指示。1941年初,廖承志在听取琼侨回乡服务团负责人汇报工作时指出:“建立根据地,除了重视地理条件外,更重要的是群众基础。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并指示:“在抗日反顽斗争中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冯白驹接受了廖承志的建议,大力发动群众参加根据地的建设,使琼崖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

办事处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是推动并领导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遵照周恩来关于“香港这块地方我们不能丢”的战略指示,为在香港建立文化宣传基地,办事处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苦心经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先后南下赴港,加强了香港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力量。办事处不失时机地通过文化界领域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复办了一批抗日刊物,如办事处主办的《华侨通讯》、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盟”主编的《新闻通讯》等等。这些刊物积极宣传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香港的抗战文化宣传带来了生机。1938年,香港曾掀起抗战宣传和为祖国内地募捐筹款高潮,特别是“八一三”献金运动,在办事处领导下取得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得到了

琼崖武装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张奋:《在烽火连天的年代里——忆琼侨回乡服务团》,见《琼岛星火》第13辑。

转引自袁小伦:《统一战线与省港抗战文化运动》(上),载《广东党史资料》第21辑,第193页。

“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的好评。

广州沦陷后,香港成为一块暂免战火的“孤岛”。然其时,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英法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谋划“远东慕尼黑”阴谋。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争取时局好转,办事处一方面先后派出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金仲华、胡一声等人到纽约、东南亚等地创办华侨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以打破新闻封锁,戳穿国民党顽固派的欺骗宣传;另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方法,将香港新成立的进步文化团体,去掉“抗敌”“抗日”字样,创办或复办的报刊则尽量采用纯文艺、纯知识的名称,以免刺激港英当局和日伪顽。前者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界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业余联谊社等,后者如《东江》《耕耘》《文艺周刊》《世界知识》《戏剧与电影》等。办事处正是依靠这些进步群众文化团体和刊物,宣传党的方针、主张,培养和团结进步青年,配合和支援祖国内地的斗争。

由于采取上述方针和措施,香港的文化宣传活动逐步展开。新闻方面,办事处领导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于1939年4月成立“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培养了一批适应战时需要的新闻工作者,创办了中国新闻通讯社。戏剧方面,金山、王莹率领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于1939年初抵港,改名中国救亡剧团,在办事处的支持下,在港演出半年多,剧目有《台儿庄之春》《放下你的鞭子》等。根据廖承志、潘汉年的指示,该剧团同年下半年移往南洋一带演出。此外,欧阳予倩率领的中华剧社,唐槐秋率领的中国旅行剧团,也先后来港演出。电影方面,司徒慧敏、蔡楚生等人同香港电影工作者合作,拍摄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最后关头》等一批抗日影片。出版方面,办事处通过“保盟”和新文化书店等进步团

梁上苑:《抗战初期的香港文化界》,载《中共在香港》,第16页。

体和书店,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并用英文向国外发行。在重庆出版的中共刊物《群众》也由重庆空运纸型到港,经办事处翻印发行。经过如此卓有成效的工作,办事处团结了广大文化工作者,初步在文化、新闻、出版、戏剧、电影、歌咏各界占领了宣传阵地,使香港成为华南抗战文化运动的主要据点之一。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南方局安排了大批不堪忍受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文化人来到香港。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办事处廖承志,就如何接待文化人,建立文化工作领导机构,领导和团结各界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办事处审时度势,认为中共在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宣传基地的时机已经到来。1941年5月,廖承志根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指示精神,成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5人组成的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并设立了由夏衍、胡绳、张友渔分别负责的文艺、学术、新闻、妇女、国际问题座谈会。中共香港文委通过这些座谈会,组织领导文化人开展及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文委成立后,办事处更加强了中共与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和对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使抗战以来香港文化宣传事业发展到高潮。仅仅在1941年间,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茅盾主编的《笔谈》、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端木蕻良、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文学》、梁漱溟、萨空了、俞颂华主持的《光明报》等进步报刊先后创刊。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刊物与1941年前在港出版的其它进步刊物,成为抗战时期香港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华商报》作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大型报纸,坚持团结、民主、进步,反对倒退、分裂、投降的方针,采用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成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一个有力阵地,被誉为“四十年代高挂在

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此外，文委相继改组，成立了一批进步文化团体和机构，推动了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国际政治军事评论等活动的迅猛发展，使香港成为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宣传阵地。

三 “秘密大营救”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即香港陷落。日军千方百计搜捕在港的爱国抗日人士，滞港的民主人士与文化人的处境十分危险。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十分关心他们的命运。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于12月8日、9日先后两次致电廖承志等：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抢救出这批民主人士与文化界精英。办事处承担起这场史称“秘密大营救”的特殊任务。

对港九的陷落，办事处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日军来势之快，港英当局投降之速，则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考虑到内地文化人来港时间不长，不通粤语，社会关系不广，应付战争环境有困难，办事处早在香港战役之初就派乔冠华、叶以群到九龙，把能找到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迅速撤退送至港岛，一时找不到的，立即通过交通站通知他们转移，在港人士则立即搬家隐蔽。同时，办事处火速派人与东江游击队曾生联系，要他们组织一支别动队到九龙、港岛协助营救工作。

接到中央指示后，办事处为协调各方统一行动，及时联系上南方局驻港代表刘少文及中共在港各方面负责人和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并广东党组织和部队领导干部，先后在香港、惠阳开了

杨奇：《一个新的课题——纪念《华商报》五十周年的回忆与思考》，载《羊城晚报》，1991年12月13日。

杨世兰等：《廖承志》，前引书，第34页。

多次会议,共同研究营救计划。会议由廖承志、张文彬召集,林平、梁广、梁鸿钧、连贯、刘少文、乔冠华、曾生、王作尧、杨康华等与会。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完成中共中央给予的任务。为此部署如下:香港方面的撤退工作由刘少文负责,办事处机要秘书潘静安协助;从香港撤退到惠州的安全护送工作由部队负责;从惠州至老隆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前东特委负责;从老隆至韶关的安全护送工作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以后由南方局和粤北省委安排。整个抢救工作由廖承志统一指挥,连贯驻老隆负责与部队、前东和后东特委以及韶关党组织的联系工作,乔冠华留韶关,主持文化人向内地疏散。

在办事处周密组织和妥善安排下,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终于顺利撤出香港,安全返回内地。这些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包括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张友渔、胡绳、夏衍、黎澍、胡风、廖沫沙、于伶、丁聪等。被营救出来的还有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如国民党驻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此外,还营救了英、美、印度、丹麦、挪威、菲律宾等国家的友好人士共89人。

“秘密大营救”是办事处最后一次重大行动。这次营救规模宏大,前后不下千人;路途遥远,行程万里,足迹遍及11个省市;成绩显著,所有人士无一伤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一胜利,不仅在国内,而且在香港、海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得到国际舆论的赞扬。

这次行动也给办事处划了个圆满的句号。在营救工作进行的同时,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除少数转入地下工作外,大部分陆续撤出,历经4年风雨的办事处随之关闭。1942年春夏之交,南委遭到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大事年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0辑,第25页。
香港《华商报》,1949年12月19日。

破坏, 廖承志于 5 月 30 日被捕, 中共在香港的活动暂告停顿。

综观办事处 4 年的战斗历程, 可以看出, 作为中共南方局的派出机构, 以廖承志、潘汉年为首的全体工作人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 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 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 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 对于支持国内抗战,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推动华南的抗日武装斗争, 掀起华南的抗日救亡运动, 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办事处的历史是中共在香港的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香港历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荣维木)